

安国药王庙庙会的类型及文化内涵

马 兰 (河北大学文学学院 河北保定 071002)

摘要: 安国药王庙庙会使传统宗教庙会与当地药业经济得到了很好的结合, 庙会的参加者有商户和四乡的民众, 庙会期间不仅有丰富的游艺活动, 而且伴随着药材、医药保健品交流活动。不仅使民间文化、民间艺术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而且也促进了地方经济、贸易的发展。

关键词: 安国; 药王庙; 庙会; 经济

安国药王庙文化已经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安国药王庙会调查”已经列入中国文化部研究课题。2010年元宵节期间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刘铁梁教授带队下, 由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师生组成的调查组进入安国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调查研究。深入乡村和基层, 调查了历史, 访问了药业老人, 收集了现实与历史资料, 并体验了安国药王庙的三次大型的庙会活动(正月十五庙、四月二十八庙、十月十五庙), 就安国药王庙的历史影响和现代演变进行了田野调查, 在此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对安国药王庙所呈现的民俗事象进行了综合研究。

一、安国药王庙会的兴衰

河北安国古称祁州, 南关药上庙内供的是药王为邵彤。安国药王庙有很大的知名度, 这与它的悠久历史和作为北方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民国以前被称为“祁州药市”)有直接关系。安国药王庙会几度兴衰与安国药业的发展紧密相连。“在将近二百年的安国历史上, 作为宗教活动的庙会与作为经济活动的药市曾一直相互依存, 是一个整体的现象。”^[1]

祁州药市, 已有千年历史, 始于北宋, 盛于明清。药王庙所藏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碑文载:“时清明寒食, 四方

瞻仰进香, 赛祷于祠下, 车轂填门, 非淫祀也。”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 庙宇再次修复, 碑文载道:“岁至清明寒食, 四方货物云集, 贡牲帛金钱告虔者, 肩摩而数击。”到明万历末年(公元1620年), 安国药市已经是“商贾辐辏, 交易月余, 盖大江以北发兑药材之总汇”了。药业全盛时期可从明朝泰昌年间算起, 至清朝康熙末年或雍正初年已形成每年两次庙会, 据雍正己酉(公元1729年)进士刁显祖所作《祁阳赋》:“年年两会, 冬初春季, 百货辐辏, 商贾云集, 药材极山海之产, 布帛尽东南之美, 皮货来岛夷而贩口西, 名驹竭秦晋而空冀北”, 可见药市之繁荣。

安国药王庙的祭祀活动与药业经济发展紧密相连。药材加工业在清末民初已经走出本地, 到外地开设商号。时经抗战时期的药业萧条, 文革时期的受到重创, 庙会活动也随之衰落。新中国建立以来, 安国药业重放异彩, 药王庙的祭祀活动恢复。1980年春在一阵鞭炮声中, 被禁止了十四年的安国药材交易会终于开幕了, 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三千多名药商蜂拥而至。安国药王庙的香火再次兴旺起来。

为满足药材交流的需要, 1985年在县城北侧新建了一个大型药业专业市场——祁州药市。从1985年秋开始, 每年两届药材交流大会就在这里召开。为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 1993年在安国城东北侧又建起了“东方药城”, 东方药城东侧施工建设的市场升级工程——东方药城国际中药材商贸中心。如今的升级广场已经是每年政府举办国际药材交流会开幕式和纪念药王邵彤文化活动的场所。自2006年以来政府在每年举办的药材交流会上安排了纪念药王文化活动, 前一天还安排一些文艺演出。官方的介入体现了“国家在场”与民间文化协同作用的效果, 在这一过程中,

得长调民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长环境, 开始慢慢的被社会流行风俗所同化, 并逐渐的被人们所忽视。与此同时, 多种复杂的文化成分也冲击着蒙古族传统艺术, 年轻人跟随社会的流行趋势, 逐渐对本民族的传统音乐失去兴趣, 这些都使蒙古族长调民歌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严峻考验, 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传承状况令人堪忧。因此, 我们要想使蒙古族长调民歌传承下去就必须改进以下几方面:

第一, 由于长久以来, 长调民歌的传承方式主要靠口传心授的方法, 使得长调民歌曲谱和文字记载的资料遗失严重, 这种传承方式只注重口头的继承, 缺少曲谱的整理和收集, 使得传唱和留传下来的长调民歌越来越少, 还会因为时代的变迁和生存环境的改变以及在口传心授的过程中, 由于传唱者的理解和个人感受等问题使长调民歌在传唱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原有的韵味, 所以必须倡导有关文化监督部门加强对长调曲谱收集和整理的工作。

第二, 长调的传播是以语言为基础, 蒙古族长调的传承存在危机, 其中原因之一就是语言和文字。要想使新疆蒙古族长调民歌这一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发展、传承, 当务之急是抓好蒙古语的普及教育, 从每个家庭抓起, 幼儿园、学校、各教育部门应采取多种措施, 开设蒙语班, 普及母语音乐教育, 做到语言从小抓起。

第三, 缺少长调的传承人, 老一辈的长调民歌演唱者相继逝世, 他们演唱长调民歌的绝技没有很好的传授给后辈, 在不久的将来, 长调民歌由于后辈人才的不足, 传承问题肯定处于尴尬境地。有关文化部门应积极大力发展长调民歌的传承人, 使得长调民歌后继有人, 让悠扬动听的长调民歌代代相传。

第四, 大众媒体宣传传统音乐的力度不够, 使人们没有更好的利用媒体了解长调民歌, 媒体更是只注重收视率而忽略了越是

民族传统的音乐就越是世界音乐的道理, 流行歌曲成了他们追捧的音乐, 传统长调民歌更是很少在大众媒体上听过, 使得人们对长调民歌了解甚少, 甚至处于被人们所遗忘的境地。因此, 有关媒体工作的部门应大力倡导人们熟识传统长调民歌, 从而为蒙古族长调民歌的传承和发展奠定广泛的群众基础。不能使长调民歌逐渐的被人们所遗忘。

结论

新疆蒙古族长调民歌作为蒙古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经过世代相传和积淀, 给后人留下的不仅是艺术, 更是灵魂和精神的享受。因此, 保护长调民歌具有重大的意义。当我们为蒙古长调的新生感到欣喜之余, 也不免为其能否长期传播和传承而忧虑。政府和文化部门在长调的传承与保护方面也做了不少的工作, 传承人的认定、保护、继承, 系统和规则的制定都不是简单的事情, 非物质文化中心的工作者们仍面临着保护和抢救长调民歌的严峻考验, 相信在他们辛勤的工作下, 蒙古族长调民歌会永久的、世世代代的传承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 [1]赵塔里木.《新疆蒙古族民歌的音乐特点》[J].新疆艺术.1996年第4期.
- [2]达·桑宝、格日勒扎布《蒙古族长调歌曲的发展轨迹》[J].内蒙古艺术.1997年第1期.
- [3]李小平《蒙古族长调牧歌演唱技巧形态初探》[J].中国音乐.2002年第1期.
- [4]斯仁那达米德.《何谓长调》[J].民族论坛.1999年第3期.
- [5]博特乐图《蒙古族长调民歌的保护与传承经验两例》[J].经验与启示.2009年第2期.

传统再次得到了形塑。

二、安国药王庙庙会的类型

在中国城乡普遍存在的称做“庙会”的活动，大部分兼有祭神和集市的双重目的。这类庙会属于文化经济型。庙会文化是“以寺庙为依托，以宗教活动为最初动因，以集贸市场活动为表现形式，融艺术、游乐、经贸活动于一体的综合社会文化现象”。^[2]庙会文化具有两重性。既是宗教的，又是民俗的。

安国的药王庙庙会即以药王庙为依托，在庙内及庙的附近展开祭祀和贸易活动，把宗教和世俗有机结合起来。参加庙会的人有的以求神拜佛为主，有的以娱乐观赏为主，有的以市场贸易为主，而这类文化经济型庙会可以满足参与庙会活动者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双重需要。

由于安国的药业发展已经具有一定的规范性，药材交易也有特定的场所，而如今的城市建设已经有特定的区域满足人们的日常购物的需求了，所以我们看到，像传统的庙会一样，在药王庙附近所形成的市场，商业交易与一般的城镇集市差别不大，而且几乎没有药材的交易。

三、安国药王庙庙会的文化内涵

庙会自产生以来，对城乡经济文化繁荣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从购物功能看，庙会比不上鳞次栉比的商铺。但是庙会期间，人潮涌动，交易猛增，其中重要原因是文化因素的影响。它唤起了老年人对传统风俗的怀旧和年轻人的猎奇。庙会既是文化市场，风俗展示，也促进了经济贸易繁荣。

庙会是文化传承的一种形式，不少民间艺术形式是庙会文化所特有的。如少林、高跷、秧歌、安国老调、吹歌。这些民间艺术形式中，有的今人已经不熟悉了，有的即将失传。

“神在庙会中的主宰地位逐渐减弱，人的地位逐渐提高，从活动上看，文化艺术活动更加世俗化，艺术、游乐、经贸活动上升为个体地位。从参与心理看，人们逛庙会，更多的是为了满足现实的物质与文化需求，文化上的供求关系在庙会上表现得更加明显。”^[3]庙会不单是善男信女参加，而且有更广泛的大众参加，成为不信教，不迷信的广大群众的文化经济行为的场所，更有社会普遍性。安国庙会已经从宗教、祭祀的精神活动，向宗教、文体娱乐、商业活动、社会交往、信息交流方面发展，成为展示具有地方色彩的传统文化与艺术，从而满足人们的物质、精神需要的场所。

在安国的药王庙会上我们看到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表演。每年正月十五庙这一天都会有来自安国各乡镇的民间文艺团体给药王献艺。以2010年为例，正月十五这一天来自安国11个乡镇组织的23道花会在人们的簇拥下从四面八方涌来，汇集而成一条条色彩斑斓的长龙，场面壮观。身披彩衣的秧歌队云扇飞；粉墨登场的高跷队缓步前行；英姿飒爽的女子架鼓队，腰鼓队；跑旱船的红男绿女动作夸张、表演诙谐，引来阵阵欢笑，传统节目在这里被演绎得惟妙惟肖。庙对面的草台子上上演着酬神的戏剧，一直唱到庙会结束，剧种以河北梆子、安国老调为主，观众自然以老年人居多。中国的许多庙会都是佛、道与民间信仰杂糅的一种状况，民间信仰的迎神酬神活动往往与佛道仪式相结合。以2010年安国四月二十八药王庙会为例，有来自深泽的念经团，来念《上香十二月》、《药王赞》经文。来自保定满城灵山普度寺的身着居士服的二十多人做法事，念《大悲咒》。

庙里人们自发的组织的各种求神、祷告、娱神、朝拜的仪式更是络绎不绝。赶庙的人来庙里上供、烧香、叩头。有烧“一道书”许愿的；有搭香山还原的；有在药王墓前求药的；有在“黄金山”（纸叠的金银元宝搭成的山型）燃尽时即兴唱赞词的；还有夕阳红腰鼓队的老太太身着红色队服列队前来表演助兴；还有退休的老年男子组织的安国“空竹队”前来表演。药王庙的大殿与南北侧殿内人头攒动，人们在跪拜神像后，相继用手去抚摸神像，然后在用接触神像的手抚摸自己身体各处祈求驱病、治病。这类似于巫术里的交感巫术，这是交感心理在做怪。

各类词言也是庙会上文化形式的一种体现，在进献给药王的供品、袍子上往往用红纸或红布条写上赠词、留言，表达许愿或还愿的心情。

在这单庙会既保存了民间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又融进了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艺术。

四、安国药王庙庙会与药业经济

庙会文化作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一种形式，更多的与当地经济结合，促进经济贸易的发展。这一点在安国的药王庙庙会表现的极为突出。

自北宋兴起祁州药市后，药材交易集中在一年春秋两庙会。清朝道光初安国药市发展到鼎盛时，发展到“春五秋七经年不断”，庙会会期延长到全年，而实际上药材交易，春庙集中在农历三四月间，冬庙集中在十至十一月间。春庙以农历四月二十八为正期，秋庙以农历十月十五日为正期，这两天前后为药材交易高峰期。历史统计，以1927年为例，庙会期间到安国的药商占总商户的78.6%，人员占总数的69.2%。可见，药材商户在安国庙会市场上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今市场经济日益繁荣，安国作为全国全国17个大中药市场中最大的中药生产和加工的基地、四大药都之一，已经形成“天下有市”的局面，而大型的交易几乎每天都有可能出现。但农历每年四月二十八依然是每年庙会最繁盛的时候，尤其是这一天会有政府参与。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虽然大型的药材交易已经不一定在庙会期间出现，但由于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主导作用，这个庙会期间仍然会有一些利干药业发展的活动进行，以2010年农历四月二十八庙会为例，政府不仅发布了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推介招商引资项目，完成了部分项目的签约，还举办了全国中药材信息研讨会，并邀请北京的科研人员和行业专家举行了“中药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这些活动都有利于地方经济、贸易的发展。

五、安国药王庙庙会的组织形式

参加庙会的人员的行为类型既有社会群体，又有个体，既有正式群体，又有民间群体。不同的参与者对庙会文化的内容、主流、变异起到不同的影响。正式群体的活动，适应大家共同需要，为某一目标，相互协作；群体成员有从属感；群体成员间相互作用（沟通、理解、关系与活动协调），有群体规范，有群体结构与界限；在时间上有持续性。民间群体是指人们在交往过程中，由于共同兴趣和目标自愿结合在一起，不需要得到官方或组织的批准，也不需要法定的规章和程序作为成立的依据。成员间相互关系具有浓厚感情色彩，群体成员把彼此忠诚、讲义气、够交情作为群体的重要规范，把感情逻辑作为重要标准。

两种群体之间有着重叠交叉。安国历史上的安客堂（安国县商会的前身，由本地药商组织的机构，类似药商公证处）曾在药王庙会繁盛时期主导安国的经济命脉，并对庙会进行筹备与管理。如今民间的非正式的自发组织的群体依然是药王庙这块地盘庙会组织与管理的中坚力量。安国药王庙会有桥北与桥南两个民间组织，大多成员是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负责敛钱、请戏、接待进香团。正式的群体由安国市人民政府组织的接待组来安排官方的纪念药王的一系列文化娱乐活动和药材交流活动。

安国药王庙庙会作为民俗文化与地方经济的有利结合，互利互惠的发展模式在中国的庙会中很具有典型性。不仅有利于民间文艺、民俗文化的传承，而且由于当地政府的合理利用，使庙会与地方药业经济紧密结合，已经收到了互利双赢的效果。

注释：

[1]刘铁梁.庙会类型与民俗宗教的实践[J].民间文化论坛, 2005年第4期.

[2][3]高占祥.民俗民风的缩影——论庙会文化[A].高占祥主编.庙会文化[M].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2年, 1—14页.

参考文献：

[1]刘铁梁.村落庙会的传统及其调整——范庄“龙牌会”与其他几个村落庙会的比较[A].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2]李振清.药王史话[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95.

[3]牛国桢、陈美建、梁学成、安庆昌[M].北京:工商出版社, 1986年.

[4](日)渡边欣雄.汉族的民俗宗教——社会人类学的研究[M].周星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

作者简介：

马兰，女，现为河北大学文学院讲师。